

救亡文叢之二

中國不亡論

宋慶齡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

救亡文叢之二

中國不亡論

宋慶齡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

救亡文叢之二

中國不亡論

每冊實價壹角貳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宋慶齡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目 錄

一	中國不亡論	一
二	兩個『十月』	三
三	致英國工黨書	三
四	中國走向民主的途中	三一
五	國共統一運動感言	四〇
六	中國應當幹什麼	四四

中國不亡論

一

寫述着中日衝突問題的書籍已有數百種，論文也已有數千篇了。然而在我看來，大部分作者卻把日本的力量估計得過高，把中國的抵抗力估計得過低。如果把過去十年間中國政府的政策考察一下，那種印象就加強了。我們對於日本是作過接連的退讓的。在日本是每恫嚇一次，便達到了它的目的。日本只消派幾許軍隊幾架飛機上陸，來威脅中國，中國政府便馬上作新的退讓了。

南京政府循着安內而後攘外的路綫，所採取的不幸的政策，甚至於反

給日本軍人玩弄着。然而，在去年中，情勢卻變化了。人民的反日運動到達了高的水準，日本人要用威脅和恫嚇獲得他們的目的再也辦不到了。中國人民已經覺悟到抵抗是可能的。他們不再害怕他們『友好的鄰邦』了。大衆的意見在中國已經透露着。在日益滋長的人民抗日的要求中間，一切政治的糾紛成爲次要了。軍事當局放任着強烈的愛國主義的勃興，這使國家有了真正統一的希望。

從我的觀點，中國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實現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山先生交給我們三民主義——民主、民族、民生——和實現三民主義的工具，三大政策。民主各國親見着：過去十年對於民權主義的忽略怎樣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禍難。內戰是接連不斷了，國家是被蹂躪了，我們的民衆有無數萬是慘死了，又有無數萬是流離失所了。中國最

有識見的人們一直要求着內戰的停止和國共兩黨的妥協。好久以前，公衆的意見就非難着一種潛伏的信念，就是我們要抗日，首先必須剷除共產主義者。自然，這個政策是日本所激起的。

十年國內戰爭的結果，全國許多部分已經遭受了破壞；而共產主義者，非但遠說不到已經打敗，還成了反日力量的前衛。從近來遊過赤區的倫敦每日導報通信員愛特迦·斯諾的論文，我們知道那邊的實際狀況，覺得那些從不敢走進『匪區』的人們所寫的宣傳文字是多大的無意識，多大的錯誤呵！其實倘說這種宣傳多半起源於日本，也是十分近情的。

蔣介石將軍已經中止了內戰，而國民黨終於在新近的全會討論到跟共產黨妥協的問題了，這是可慶的事情。然而這卻是很可憾惜的：在這屆全會宣言中，所定的跟共產黨妥協的條件會使順利的妥協難以完成。那裏有

着種種不合理的條件，如共產黨停止宣傳及放棄他們階級鬥爭的政綱等。宣傳和階級鬥爭是共產黨存在的基本理由，它怎麼能夠拋棄呢？在法國及其他地方，共產黨沒有放棄宣傳和階級鬥爭，而布爾喬各黨跟他們合作是成功的。中國共產黨屢次宣布着：如果政府真正要抗日，他們就不攻擊政府了。共同救國是他們唯一的條件。

所以，爲了跟共產黨的妥協，只要把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實行起來，召集國民大會，變更選舉制度，使人民可以真正參加，而在政府中間得到發言權，釋放政治犯，允許出版、組織及集會的自由，並且爲了國家的建設，和對日本軍人的抵抗，把大衆動員起來。

共產黨願同政府合作的誠意，經過了西安事變，得到顯著的證明。他們爲要維持中央政府和東北軍之間的和平，盡了一切的努力。那發動着釋

放蔣介石將軍，及和平解決西安事件的是共產黨。所以如果國民黨想要遵循中山先生的聯合工農政策，它就不該拒絕共產黨的幫同救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合作是絕對重要的。一切的力量必須聯合起來。

二

有許多不正確的關於中國的意見流行着，以爲中國弱到不能抵抗日本。我深信中國不但可以抵抗日本任何的侵略，它還能夠，而且必須準備收復已失的領土。中國最大的力量存在於大衆的覺醒。如果好些時候以前，日本帝國主義者抱有使南京政府做他們征服中國的工具的希望罷，這熱切的希望現在是必須消失了。日本歷次侵略行爲使中國的抵抗力步步加強。日本支解中國的政策是失敗了。相反的，中國不會再有一個政府敢在領土上對日本有新的退讓。當去年救國會諸領袖給南京政府逮捕了去，以

及政府顯出考慮對日本作新讓步的徵象來，那些時候，民衆的憤怒激發得很高。反日運動的發展使金融改革得以進行，可慮的廣西事件及西安事件得以和平解決，而內戰也得以停止。這一切是無可爭辯的中國新力量的證據。

中國現在必須準備收復它的失地了。政治上軍事上，大衆不可不有着準備。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是可以喚起大衆的。壯丁的軍事訓練是必須履行的。中國的國防，單憑着缺乏技術設備的常備軍的基礎，不能建立起來抵抗侵略者。但在這軍隊的後面卻站着人民大衆，準備爲他們的家鄉他們的祖國流最後的一滴血。在游擊戰中間作戰，他們會成爲無敵的武力，日本軍人面對着這武力一定要發抖的。

要使中山先生的經濟政策有着活活的現實性，必須使人民的大衆運動

得到自由的表現。就國家的新建設，我們工業和交通上的穩固的設施，以及我們農村經濟的改善來說，這也是先決的條件。只有當真正的民主政治實現的時候，我國那一種基本的創業才能夠見功。

中山先生勸告中國，在外交政策的實施上，應當聯合那些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日本的侵略無疑地已經喚起了全世界對於中國的同情，以及其他國家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政策深切的不滿。日本是處在孤立的地位了。日本要從德日協定打出一條路來的企圖也落到了完全的失敗。在日本本國，對於這項舉動的不滿空氣正在滋長着。中國人民從未抱着侵略的意圖，但是中國人民却也不再會繼續做着從自己的故鄉被逐的無家的奴隸，或是忍受着中國是東亞病夫這一句嘲罵了。

要估計任何國家的力量，我們最好還是把它那經濟的潛勢力和它那社會機構的力量分析一下。就經濟來說，日本是弱國。它那主要的弱點是在原料——如鐵，棉花，煤油，雜金屬，金，白金等——的貧乏，這一項日本每年不得不有大量的進口。原料的貧乏是日本在戰爭上最危險的弱點，因為戰時它就要依靠別國，而別國呢，是隨時可以斷絕對它的供給的。

在平時，日本沒有把這些原料大量地積儲起來的可能性，因為它缺少資本。它不能為這種目的投下巨額的資金。就把幾種統計引證一下吧：日本現在每年為着它的金屬工業輸入原料耗費了二萬萬到二萬五千萬圓日金。讓我們來想像一下，到了需要增加了許多倍的戰時，它得耗費到多麼大呵。而日本所有的金準備總計只有六萬萬圓日金。在一九三四年日本輸入全額中，原料佔有百分之七〇，在一九三五年佔有百分之八〇，而在一

九三六年，則它全部輸入的百分之八二屬於原料。如果我們單就軍事工業基本部分的製鋼工業來考慮一下，那麼我們就見到；一九三六年得輸入原料（鐵，鐵屑）的百分之四〇。一九三六年所用鐵砂全部百分之八七是輸入的，把這事實注意一下，日本的弱點就愈加明顯了。這些輸入大部分是從中國獲得的。如果我們拿另一重要的原料——煤油——來說，我們就發見日本不過生產它的需要量的百分之八，必須輸入其餘百分之九二。別的原料，如鉛，棉花，羊毛，水銀和銻等，日本則必須輸入它的需要量的百分之九〇。

對於這一切巨量的輸入，日本非用它的輸出來支付不可。即使平時，它要這麼辦也是極其困難的。它的困難年年增加，去年它的貿易逆超幾近一萬三千萬圓日金。這樣，日本工業基礎的不健全是十分明顯的，尤其是

就發動戰爭來說。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轉到日本的農業，那麼我們見到：據最近的統計，生產量是年年衰落下去。一九二九年，是四五萬萬圓日金；到一九三五年底，是三二萬萬圓日金。農產品和工業品市價間的不協調步步尖銳起來，使農業條件更不利了。一九三六年，貧困的農民把債務積到五〇萬萬圓日金，而日本還得輸入必需的食料品五分之一來維持它那已經很低的生活標準。日本的農民從三種不同的剝削捱受着痛苦。地主在田租上收取着禾稼的百分之五〇到六〇，國家則每年加稅，爲的是要付軍費，而最後則工業資本在工業品上高抬價格使農民愈益困頓。

日本報紙討論着這一農民貧困的問題，日本人自己也對他們的農業區域抱着悲觀。因爲士兵的百分之七十來自那些區域的緣故，日本軍人自己

是意識到這危險而耽憂了。鄉村社會的不安是明顯的，這裏就存在着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弱點之一。在最近的議會裏，有着新的六年整軍計劃的提議，需經費三〇萬萬圓日金。在今年，一九三七年，日本的軍事預算比一九三六年增加到三萬萬圓日金以上了。

這項經費的大部分又得從農村徵取。這意義就是在已經貧困的農民身上加上了財政的負擔。本已削弱的機構這才承受到新困難和新恐慌了。

日本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對於長期戰爭是不夠堅實的。日本軍人必然是不能希望在短期的戰爭中征服中國。如果在平時日本的經濟就竭蹶到極點，而它的社會機構受到不安的威脅了，那麼這些衰弱的機構怎能擔當亞洲大陸上的戰爭呢？

中國是否不會給帝國主義日本打敗，這甚至不復是還待討論的問題

了。日本要擴張在華北的控制的努力已經失敗了。在綏遠，中國軍隊已經勝利地擊退了侵擾的日匪。日本對我政府的要求也經拒絕了，日本在中國失着面子。日本軍人要用軍事侵略威脅中國的新恫嚇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促進中國的統一，加強中國爲獨立而奮鬥的決心。

對着中國人民要全國動員這一種自發的欲望，對着富於天然資源的中國非常廣大的領土，對着四萬萬的人口，日本的力量僅僅成爲一隻紙老虎了。日本經濟的和社會的機構是支持不了跟中國人民的長期戰爭的。

是的，即使中國非單獨跟日本戰爭不可，中國也不會被打敗呢。而且中國不至於孤獨着。因爲中國是得着世界的同情的。

兩個『十月』

十月十日，我們慶祝中華民國成立的二十六周年紀念。這是推翻腐朽滿清，誕生嶄新民主政體劃時代的一天。這是中華四萬五千萬人民擺脫他們的枷鎖，從封建的黑暗中向着一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道前進的一天。我們是這樣希望而且相信着。我們曾爲這個而奮鬥着。

當一九〇五年，俄國人民還處在黑暗的反動地獄中，他們的革命高潮給沙皇的恐怖所遏壓，而社會主義的遠景一時只成了千百萬人心底的夢想。那時候，孫中山先生也正爲中國的自由而夢想着策劃着。他草擬了許多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和國家工業化的計劃，他主張中國社會有澈底的改革